

21 世纪中国文学大系

主编 陈思和

2001年中国香港

最佳文学

21^{SHIJI} Zhongguo
Wenxue
Daxi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1年中国香港 最佳文学

本卷主编 李安东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1 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 年中国香港最佳文学/陈思和主编.
-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1

ISBN 7-5313-2398-2

I. 2… II. 陈… III. 华人-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2001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3712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字数: 250 千字 印张: $10\frac{3}{4}$ 插页: 2

印数: 1 - 6 000 册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韩忠良 唐惠凡
封面设计: 耿志远
印刷监制: 张 斌

责任校对: 潘晓春
版式设计: 马寄萍

ISBN 7-5313-2398-2/I·2100

定价: 19.00 元

总 序

陈思和

公元 21 世纪的脚步悄然走进我们疲惫不堪的生命旅途，这虽然是人们期待已久的时刻，但当我们身处 2001 年年底来盘点新世纪第一年的文学成果时，却多少有一些若有所失的怅然。春风文艺出版社耗巨资推出“21 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 年最佳”十种，以期能为新世纪文学创作留一珍贵痕迹。我受命于朋友们的信赖，担任了这一大系的主编工作，约请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把卷展读，兢兢业业，不敢有任何的轻怠。越读到后来，就越感到难以下笔总结。这一点感觉，我的几位担任分卷主编的朋友们也有所知，只要读每卷序言便不难体会到这种难以言说的意思。

当然这并非是说，新世纪的文学创作并无创意。只是

与新世纪的中国内地在经济上加入世贸、体育上足球出线、外交上申奥成功等一系列象征“国运”的喜庆相比，与理论界有关“全球经济与本土民族化”、“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热烈争论相比，文学创作似乎过于平淡，甚至没有轰动一时的争鸣之作。因而在今年以来，表面上看去是文化兴而文学衰，无所不包的文化批判大有取代文学当年所承担的社会全能的趋势。而文学似乎难以与时俱进，无法积极应对时代提出的新的挑战。但也有一种相反的看法认为，这正是我们的文学开始成熟了。正如一个洞察世故的成熟的人一定是我行我素、处惊不变的人。稍经一点风浪就大喊大叫的，总不外是没见世面的毛头青年。全球化究竟会给中国经济和文化发展带来什么样的新问题，目前谁也难以预料，而生活还没有充分展开的现象要求在文学上加以深刻的揭示，也是勉为其难。我们自然可以从政治家或者理论家那儿找来一些观点、逻辑以及外国的经验材料，然而这与生活实际所展示的丰富性相比，毕竟显得又表面又肤浅。文学如果从观念出发来揭示所谓的“社会生活本质”，虽然会一时哗众取宠，却不可能真正展示生活本身的丰富性与真实性。我们的文学正处于无名时代的文化状态下，其不可能像共名时代那样，有一个统一的目标和统一的世界观。人们对生活本质性的关注早就让位给对生活具体细节的感受，这就必然要求多元化，感性化，要求文学创作善于从具体的生活现象中，揭示出作家对生活的感受程度。文学是否需要来应对时代的挑战？它应该如何来应对时代、以致调整与历史进步的关系？显然，这不一定是文学所必须回答的。文学创作自有自己的

艺术审美规律，不能也不必要按照历史进程的规律而盲目追随，上一世纪的文学史经验教训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以上两种对文学的评价观点，其实都生成在我的脑中，盘桓在我的心间，分裂着我的情感。本来在上一世纪最后二十年里已经有了普遍共识的文学本体观念，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似乎又有了重新讨论的可能。作为人文学科的研究学者，如果我们无法概括出一点能够涵盖主要社会症状的社会矛盾规律，那么我们如何来衡量文学作品对社会的深刻理解？如何来评价作家面对生活的创作动机和创作心理？回顾上一个十年之初，当一种深沉的挫伤感折磨了作家最敏感的心灵痛处时，我们读到了像《心灵史》、《叔叔的故事》、《九月寓言》、《我与地坛》等最让人们激动的作品，在形似涣散的精神状态下知识分子的凛然正气依托了民间大地的滋养决然而起，这是记忆犹新的历史。然而，当历史平安过渡到新世纪，这样的深沉感被严重蚀化了。当然我们不能说21世纪之初风波不兴，但与我们切身的关联似乎不多。与上一世纪相比，确实，一百年前戊戌之痛庚子之乱辛丑之耻的记忆已经淡漠，九十年前辛亥之变共和之梦的激情已经过时，八十年前外争强权内惩国贼的愤怒已经消解，七十年前外祸内乱明末历史重演的忧虑已经陈旧，六十年前河山破碎杜鹃泣血的刺激已经遗忘，五十年前百废待兴强国之梦的狂热已经破灭，四十年前闭关锁国夜郎称王的梦呓已经清醒，三十年前浩劫当头群魔乱舞的恐怖已经消散，二十年前死里逃生般的洋插队狂潮已经平息……一百多年来中国被强制性纳入世界性格

局以后，像恶鬼般苦苦纠缠着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无非是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即如何治愈痛到心灵深处的弱国受辱的创伤。然而，当新世纪悄然来临时我们的百年情结似乎突然释放了，于是我们兴高采烈，顿时失去了许多记忆。于是我们这个民族中的有些人，在“9·11”事件发生之初，会有人对灾难幸灾乐祸地窃笑，当海峡两岸偶有风波之时，会有人摩拳擦掌闻鸡起舞。魔鬼在原始正义感的旗帜下又一次利用了人类的盲目和狂热，使人类理性和民族自省注定要经历另一场严峻考验。我感到困惑的是，我们许多知识分子孜孜不倦地探寻着还没有完全展开的未来历史规律，匆匆预言未来生活的本质性矛盾时，对这些弥漫在当下日常生活中的复杂现象复杂心理却漠然置之。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冲突，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对未来历史发展的共识，但如果用这样的理念涵盖了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理论又一次走在创作的前面，那么，对文学创作究竟是祸是福？我总觉得中国眼下的景象有点不自觉地重复着中国 30 年代的历史旧象，具体的证据不必在这里说，关键是我们的知识分子能否走出历史划定的怪圈？这就是世纪之交时鲁迅传统和鲁迅精神引起激烈争论的最深刻的社会原因，我想，也是知识分子将如何在新世纪继续薪传人文理想的最直接的社会原因。

随着中国进入 WTO，全球性的经济体制肯定会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否可以由此推论，以后的社会主要矛盾就是全球化与本土民族的矛盾？我觉得要考察这个历史事实也必须充分意识到另外一个历史事实，即中国的全球化问题是在追求现代化的前提下发生

的，事实上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地追求现代性，都是全球殖民化背景下第三世界国家别无选择的道路。我们每一步行走都伴随了痛苦的代价，但又是摆脱东方亚细亚式的野蛮与专制的必要过程。鲁迅在 30 年代就告诫人们，不要在宣传沦为民族奴隶的痛苦时忘记了做自己人的奴隶也同样是痛苦的。这些现象的复杂性就在于无法用浅显的方程式排列出社会现象的正反两面是否等值，复杂现象很难用理论形态来说明，于是我们就需要文学，需要艺术家们用含混但又是极为丰富的艺术形象来表达日常生活给予我们的复杂的审美感受。

文学研究者要对文学形象的独特性进行透彻分析，就离不开对生活的透彻的理解。而如果从一个理论观念出发去看待生活现象，或者用孤立、互相割裂的视野来考察生活中现象，都很容易片面放大生活中的某一个或几个因素，而不能尽可能全面地历史地考察生活现象。虽然，这不是文学的任务，也不是文学研究者的任务，文学创作者真正关心的是他对生活的全部感受是否能够准确完整地表达出来，文学研究者的工作是考察这些艺术感受是否能够唤起相应者的感情的共鸣，由此来决定作品的真正价值所在。用旧俄时代的文学史为例子，惟有诞生了奥勃罗摩夫这一不朽的艺术形象，才有可能产生出对奥勃罗摩夫性格的不朽的分析，从而才会产生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者对旧俄社会的透彻批判的精神影响。一切都不能倒着运转。一个时代不管其伟大还是不伟大，都会以极其丰富复杂的内涵来滋养文学家的心灵，关键在于我们的文学家是否真正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如果从这样的意义来理解文学，我在前面所列出的盘桓于心间的两种感受也许并不矛盾，因为一个真正直面生活本身、与广大社会底层的人类呼吸与共的艺术家，他本来是不会舍弃那种来自生活、又是与生命血肉相连的艺术感受，而他所要舍弃的，恰恰是来自生活以外的属于人类观念性的因素。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讨论文学，那么，从上一世纪的 90 年代以来，文学创作所发生的悄悄变化正是趋向这一轨迹。放弃高调，脚踏实地，以具体的个别的感性的艺术追求来开辟文学的新境界。从我们所选的十卷文学大系中，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这一变化的痕迹。换句话说，新世纪第一年的文学创作，正是上一世纪文学走向的顺理成章的自然发展。

在新世纪的第一年中，作家们依然沿着原来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用独特的敏感来体验着日常生活的刺激。我们在编选大系的过程中故意不推荐那些乌托邦色彩过于浓厚的作品，相反，有些让人读之感到震动的艺术作品，恰恰是显得有些陈旧的内容。如中篇小说卷收入的《奔跑的火光》（方方著）和《玉米》（毕飞宇著）两部小说所描写的农村妇女的命运，可以发生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惟其是发生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才显出中国妇女命运的可叹可泣。《奔跑的火光》的故事发生在当下的农村社会，一方面是商品经济使农村妇女产生了追求物质与自由的欲望，失去了原始的道德感的乡间娱乐也使她们有了赚钱的机会；但另一方面，在一个经济上比较富裕、男性农民不需要去“南方”打工的农村环境里，传统的生活观念又是何等野蛮地制约了人们的命运。一个现代背景下发生的古

老悲剧，不能不让人对当下生活产生深刻的反思。我们再读散文卷里所收的长篇对话《杜高档案》，讲的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知识分子所遭遇的微不足道的真实命运，但惟其真实性，才使我们从中感受到档案制度在现实生活中可怕的威慑力，让人毛骨悚然。这样一些问题虽然属于历史，但对当下生活的认识，能说是已经过时了吗？相反，过于贴近当下生活的故事，有时也未必能产生真实的力量。我在审读短篇小说卷时删除了一篇曾被有关杂志看好的作品《找打》，这篇小说反映民工遭受现代资本家欺压的遭遇并非没有价值，构思中也不乏吸引人的独特性与巧合性，但问题在于传统现实主义的叙事技巧总是在情节上制造出为了强调效果而编造的夸张痕迹，使艺术感染力不能不受到损害。即使在入选的《马义的眼泪》和《拉车人车小民的日常生活》两个短篇里，这样的夸张痕迹仍然是在所难免。我同样很赞成艺术必须接触人间苦难的说法（之所以选这两个短篇，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审美考虑），但是我仍然希望看到人间苦难与心灵感受这苦难的过程中所涌现的灵魂大搏斗和大痛苦，那是不应该为技巧所侵害的一种纯粹的艺术境界。

我们注意到当前的小说创作和散文创作多少代表了文学的主流，也就更加能反映出某种客观的束缚，于是在选择中较多地有意于体现民间立场与个人立场的好作品，而在诗歌、儿童文学、网络文学等卷里，选择的余地则要更大一些，那里的发表空间要宽阔得多，从而也更能体现出创作心灵的自由形式。为了更全面地反映新世纪文学的面貌，我们还特地设置了与中国内地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氛围

不一样的中国台湾文学、中国香港文学^①和翻译文学等卷，以另类的姿态与中国内地的文学创作正好形成比较和对照，使我们的读者更加直接面对各种各样的文学，感受到文学的丰富性和心灵的丰富性。只有在文论卷里，我们稍稍涉及了一些知识分子所思考的宏大理论，但也是反映了文学评论领域的各类意见，并非有什么导向性的意见。

这次所选的各类文学作品，涉及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如在我们内地的出版历史上，从未有过专门的翻译文学、中国台湾文学、港澳文学、文学理论等领域的编年体文集，所以这项编辑大系的工程给我们带来一定的难度，因为没有经验，遗珠之憾总是难免。但我还是要感谢我的合作者，他们的辛苦劳动推动了这项工作，使这十卷书能以完整的面貌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这套大系的编选原则与我们以前主编的《逼近世纪末小说选》基本相同，那就是充分注重编选者的个人审美态度，不随大流，更不随媒体的宣传，凭独特的眼光来考验文坛也考验编选者自己的声誉。每年一辑十卷，雁过留声，方方面面地保留下新世纪文学的信息，为当今文学创作保留一份坚实的行走脚印。

2001年12月4日于黑水斋

注 释 ①本卷原来安排是港澳文学卷，后因没有入选澳门文学，所以改为香港文学卷。

序

——2001 年香港文学景象

李安东

香港文学的 2001 年是一个让人感动的岁月，随着新世纪曙光的升起，正如本卷首篇的题名一样，香港文学新的“创世纪”开始了。当我完成本卷的编辑工作，掩卷静思，深切地感到，香港文学的薪火已经传到了中生代和新生代的手中，特别是新生代的迅速崛起，大有香江后浪推前浪的势头，这预示着香港文学的明天是充满希望的，同时也是香港老一代作家辛勤耕耘、大力扶植的硕果。

—

香港文学与现代主义有着不解之缘，这因为香港是中国版图内现代化最充分的城市。都市化意味着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较之以前的农业化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种转变既是落后向先进的迈进，也是又一个困惑人类的陷阱。揭

示这一陷阱中人性的异化和扭曲，表现陷阱中人们生存的痛苦和挣扎，是自 50 年代以来香港文学的一个绵绵不绝的主题，并构成了香港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本年度的香港文学中，这一主题继续得到了延伸。一些作品不只是在叙述故事，而是在讲述关于香港的寓言。潘国灵的《母与女》充满了鬼魅的气氛，连结祖孙三代女人纽带的是“血”和“鬼”：婴儿在血污中诞生与女人的经期出血使她们逃脱不了一种宿命的轮回，而讲述灵界的鬼是她们生活中惟一的沟通。在她们之间，腐烂与新生同时产生。这祖孙三代女人“血”与“鬼”的宿命结构可以看成是所有女人无法摆脱的一张命运之网。王貽兴的《白袍人》模糊了阳界与阴界、“我”与他者的界限，造成扑朔迷离的诡异性。白袍人原本是穿着白色厨衣、站在热闹街区的饺子店广告员，但是在“我”的眼里，他们却似乎来自鬼界，对现实生活构成了压迫。作者不断变换叙述角度，以极强的语言张力营造了一种砭人心骨的人间“鬼”气。这两篇小说的作者都比较成功地运用了魔幻手法，走的是也斯小说的一路。

人与人的关系在男人、女人这个主题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在现代社会，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是在各个层面上展开的，而性冲突又是最基本面的。从上个世纪开始，性冲突就一路走高，拉出一根太阳线，这已构成了现代文明社会的一道风景。人格的觉醒与女权主义的怂恿，使女性再也不甘附庸为男人的肋骨，青春期的交欢逐渐颓败，让位给了疲软之后从意识底层浮起的冲突，吴季的《镜中生活》以暗喻的手法阐释了两性间这种从合到分的无奈结局：“夜晚无星，只有粉红的云/颤抖着，像咳不停的肺/肉体合二为一，借助短暂的/青春继续这镜中蒙尘的生活//自行车铃声，轻骑突突突/一盆吊兰跌碎在阳台上/像一个信号——寂静加深了/肉体一分为二，窗帘//……拉开，在镜中”，世界又归于寂静，灵魂的孤独也许才是现代社会的本质。而洛谋的《创世纪》

更是在极短的篇幅里速写了现代亚当与夏娃邂逅——上床——分手的快餐爱情经典。有趣的是比吴季、洛谋年长的实力派作家陶然在《岁月如歌》中却演绎了现代社会中一个充满古典韵味的“老情人”故事，印证了一曲怀旧老歌：“唱歌要唱老情歌，情人还是老的好。”把这三篇作品放在一起，传统的香港与现代的香港、古典的情怀与一次性的现代节奏形成鲜明对比，两者共构了当代香港人的生态与心态。

昆南的《天堂舞哉足下》把两性之间的角力展示得淋漓尽致。女性之门，对男人来说，生于斯，死于斯。当男人进入女性身体，扬扬得意之时哪能想到此时的他其实就如棺材里的死尸，女人的容器就是棺材。然而女人并不因此就能控制男性，她依然是感性的，盲从的，是男人眼中的客体。当胡眉张开U字形的下体吞噬男人的时候，她无法不屈服自己的盲从，说出了：“你记住，我是属于你的。”女权主义又一次处于下风。陈汗的《滑鼠流星》表面看来写的是一个比较前卫的女性，她对男人的要求就是必须“舔”她的下体，其实也就是力图通过“性”让男人低头。但是当她沉迷在这种“性政治”的游戏中时，就身不由己地被对方控制住了。男人一直是“政治权力”游戏中的高手，当他发现自己的权力正在某个权利场中被剥夺时，就会抽身离去，不玩了。《滑鼠流星》让我非常滑稽地想起了古诗《诗经·氓》中写到的：“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面对无物之阵，女人哭泣了。她低声下气地恳求男人回来，她知道这是不可改变的：“生命正在死去我改变不了也不想改变。”这是两篇让女权主义感到愤怒的作品，但是男女间的不平等在当下社会却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女权主义摆脱狭隘的政治视野，争取与男性共创一个“双赢”的局面。

老子曾经构想过农业社会的高级形态，那就是小国寡民，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个设想在广袤荒凉的农村未曾实现

过。有趣的是，在空间拥挤、资讯发达、人际关系呈网络状的现代化都市，人与人之间反而更加疏离了，倒是出现了鸡犬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形。这种疏离是灵魂的疏离和隔膜，久之，便形成了心灵的自闭。邱心的诗《办公室两题》将最具都市心态的白领那种空虚无聊而又心神不宁、无所事事而又寻找刺激的情状表达得非常到位。黄静的《寻人启事》是两颗百无聊赖的灵魂在被寒流袭击的都市空间寻找温暖的刺激，以此脱开身边可厌的家人和朋友，可是当陌生的灵魂相对时，寂寞依旧，更多了一份尖刻与不容忍，各自重回原来的轨道，该怎么生活还是怎么生活。小说蕴含着人生一个悲哀的命题：他人即坟墓。无论是贴启事寻人还是上互联网上寻人，结局都是在本已心灰意懒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失望的盐。

二

香港作家历来重视文学表现形式的创新，探索能够充分表现香港人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的艺术形式，从刘以鬯到西西到也斯再到当下，香港作家一直在不停地往前走，显得非常前卫，这是香港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2001年的香港文学，延续着“前卫”的香火，继续着富有创意的工作。

在2001年的香港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有魔幻小说、后设小说、装置小说、对写小说、寓言小说等，这些小说以不同的形式共组了香港文学的奇异。西西把写作比喻为“跳飞机”，是一项冒险的游戏。之所以“冒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她对叙事方式的不断交换，在过去的《肥土镇系列》作品中，西西做得比较成功。今年，西西的《巨人岛》把故事发生的地点搬到了属于肥土镇的一个小岛“巨人岛”，这是一个虚构的现实，然而和《肥土镇系列》的构思异曲同工，是可以和真实的现实挂起钩来。

“巨人岛”的历史演变暗合着香港社会历史的演变，这个寓言故事可以看做是作家对香港的评点。宇无名的《贮梦所》是一篇后设+科幻的小说，作者打乱时空界限，由阿富汗的山区到中美洲的地震灾区，由塔利班人的记载到杭州火车站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告别，由六亿年前的深海到外星，跨度之大，想象之诡异，显示了作者谋篇布局的功力。袁兆昌、黄敏华的《对写》以男女双方对写的方式来表达对对方的感受，这些感受或是用电邮发给对方，或是写给自己的。这种结构的旨趣是让双方都能以第一人称的身份直接碰撞，直奔灵魂，而不遮遮掩掩。谢晓虹的《大厦》有点类似好莱坞电影《偷窥》，用一台监视器，摄录下了秘藏在都市楼宇间的隐私。偷窥隐私，也是想从侧面证实自己平时见不得人的行为的合情合理合法。作者从偷窥者的角度把窥视到的隐私告诉读者，并以英文字母H、J、K、L、M等给小说中的人物命名，意在说明太阳底下没新事，人们的隐私大同小异，也就那么点事，这些人物其实就是你我他，他们和你我一样，过的是普通香港人的普通生活。昆南的长篇小说《天堂舞哉足下》是装置小说，顾名思义，就是可以截取小说的任何一段而独立成章，用作者的话说：“本书每一个情节，可以独立发展，甚至随意‘肢解’，然后‘拼凑’之后，仍能够‘生长’，就算‘夭折’，也会出现弹性的‘夭折’。”这种积木式的随卸随装的写作方式，是作者事隔三十多年后重新写长篇小说的一种尝试，可见其老骥伏枥，探索艺术的勇气。我们就按照昆南先生的设想，截取了其中的一段：《O与烟花》，读者不妨尝个鲜，品一品味道。

香港诗歌向来有传统和现代两股流向，其中又不以老年人和青年人为划分的界限，全因个人的性情和兴趣而定。还有的诗人，为了探索文本与所指的对应，既写传统诗，又写现代诗。马俐的《梵音》古韵十足，好似天籁。林幸谦的《心事塑立各种人为的中年》让人感叹生命的无奈和流逝。叶英杰的《某天，和她

一起看电影》、璇筠的《誓言的诡辩》是情网中人对爱的执拗和迷惘。黄灿然的《芸芸众生（二则）》描画出了香港人的生活情景，其中既有自然法则的不可抗拒，经济法则的无法逃避，也有人心的蠢动。以上这些诗，大抵走的是传统一路。

邱心的《办公室两题》表达了现代白领的心态，鲸鲸的《迷路人@镜中刻月的桃花源》写出了现代人的迷失，陈灭的《坟前地》画出了一幅都市文明的“恶之花”。这三首诗走的是现代一路，将它们合在一起，可以解读出现代文明的二律悖反：人类创造了现代文明，又被现代文明所累。现代文明带给了人们丰裕的物质和便利的生活，同时也造成了生存的空洞和黑暗。人们在面对现代文明这个庞然大物时，越来越感到自身的平庸、委琐、荒谬，感觉不到人的力量，并由此产生焦虑和绝望。这种焦虑和绝望已成为现代人的精神特点。

黄茂林的《地点》、刘芷韵的《等待他把电话挂掉》、小泚的《学习》、麦树坚的《我们的童年和玩具城》涌动着青春期特有的那种优雅的伤感、轻轻的沮丧。这四首诗的魅力来自于青年人的热情和敏感的心灵，他们像植物感谢阳光那样虔诚地记录下了他们的成长。他们的笔调自然流畅，我们如聆听音乐般聆听他们的歌唱时，就能走进他们的心灵。

在散文方面，刁予的《灭族》构思情趣巧妙，以碟子的前后不同遭遇见证了夫妻俩如何从结婚时的恩爱到婚后不久的吵闹。以无生命的物件写有生命的滑稽，是这篇文章的独特之处。胡燕青今年保持了良好的创作势头，她的散文《在牙缝中飞翔的红色翅膀》写了“美孚”社区的日常生活。作者用贴纸簿的方式，分门别类，分别是“女人和女人”、“男人和女人”、“男孩和男孩”、“男人和男孩”、“女人和男孩”。作者在这小小的五张贴纸中，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他们的世俗生活、他们的人生幻想。文章的标题很贴切，将世俗与幻想令人发噱地组合在一起，